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华基金研究课题

超越错误

BEYOND MISTAKES

文援朝等 著

超越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62 7385 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华基金研究课题

超越错误

——医错哲学及其应用研究

文援朝等 著



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

• 1995 •

【湘】新登字 010 号

主要撰稿人(按各章撰写次序排名):

文援朝 王静芳 吕耀怀 黄河 周才文

超 越 错 误

——医错哲学及其应用研究

文援朝等 著

责任编辑:梅敦诗

*

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大学印刷厂印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75 字数:256千字

1995年11月第1版 199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

ISBN 7-81020-802-0 / B · 019

定价:10.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生产厂家联系解决

内 容 简 介

该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华基金研究课题——“医错哲学及其应用研究”——的最终研究成果，是《错误论》的续编，被列为湖南省1995年“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的申报选题。它首次界定了“医错哲学”的概念，创立了一门新的医错哲学学科，阐述了医错哲学的研究对象、目的与方法，揭示了错误的本质及特征，从新的角度系统地分析了错误的发生机制，对错误的类型与构成，以及辨错、治错、防错和化错等问题进行了方法论的探讨，提出了把医错哲学应用到道德、经济、教育、科技、司法、政治、军事、人生等领域的构想，并对道德错误的矫治与社会控制、经济错误与经济犯罪的关系、宏观的和企业的经济错误的防治等问题作了初步研讨，为人们在实际工作与生活中深入地思考错误之谜、有效地超越错误，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思维方法。

该书文字优美，语言流畅，融哲理性与通俗性、思想性与艺术性于一体，是一部可读性强的学术专著。适合于对错误之谜感兴趣的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和有关研究人员阅读、参考。

EL66/29

序 一

《超越错误——医错哲学及其应用研究》这部专著（以下简称《医错哲学》），是文援朝同志对他所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华基金研究课题——“医错哲学及其应用研究”，经过三年的艰苦探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当我翻阅这部专著的目录和部分章节时，便感到耳目一新，惊喜、赞叹和敬佩之情油然而生，我真想一口气把它读完，我也想广大读者能分享我的这种感受，故当这部专著即将付梓面世之际，我斗胆为之作序，以向广大读者推荐。

记得小时候，听大人讲过一个这样的故事：最初，真理和谬误原是一对孪生兄弟，他们形影不离，相依为命。后来，随着年龄的逐步增长，谬误便发现，人们对真理格外青睐、仰慕，真理成为大家追求的对象，而自己则饱受冷落之苦。对此，它越来越难于忍受，妒嫉和愤懑使它决心要取真理的地位而代之。它苦思良策，终于，感到真理之所以能如此，不过是因为它光彩照人、装着入时。于是，它说动了真理同它去游泳。真理不知内里，贸然脱下衣服，跳入河中，谬误便乘机穿上了真理的外衣，扬长而去。从此，真理变得赤裸裸的，失去了人们的青睐，而谬误则因此而华丽可鉴，楚楚动人，使人迷醉，以致人们常常把它当作真理而为之倾倒、追慕。听这个故事时，由于年龄还小，不谙世事，只是觉得谬误太不像话，居然陷害自己的兄弟，真该千刀万剐！至于这个故事所蕴含的深刻哲理，当时我是全然莫解的，只是后来随着我的年龄的增加，阅历的长进，才

逐步有所领悟。确实，在生活中，真理和谬误总是如此难分难解，而人们追求真理时却又总难免不为谬误所迷惑，甚至因此而远离真理、拒斥真理，这就难怪自古以来，人们常常发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的慨叹。过者，失也，也即是谬误、错误。甚至像中国古代的老子这样的谙于世情的深刻的思想家，在如何识别真理和谬误、正确和错误的问题上，也感到无能为力，不得不对世人发出“对之与错，相处若何”的警戒。

人们谁也不会说自己不热爱真理，谁也不会承认自己愿意与谬误相伴，同错误为伍。不管这是否出自至诚，发自肺腑，生活的逻辑要求人们必须进行这样的选择，作出这样的承诺。事实上，古往今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了追求真理，或俯读仰思，冥心妙契，呕心沥血；或为民请命，舍身求情，慷慨悲歌。正因为这样，才有科学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文明的积累。然而，在科学的发展中，在社会的进步上，在文明的积累里，哪一步又不包含着战胜谬误、超越错误的艰辛及其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呢？如果说一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不断追求真理、发现真理的历史，那么，同样也可以说它是人类战胜谬误、超越错误的历史。可是，直到现在，我们有数以千计、万计的各种科学学科从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各个层次来研究真理，揭示真理，阐发真理和传播真理，却没有一门专门研究谬误、揭示错误的科学学科。这样一种现象的存在，如果说可以从“真理难求，错误易得”这样一个普遍的事实得到合理的解释的话，那么这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只有战胜谬误、超越错误才能求得真理吗？既然谬误、错误是如此容易地设置重重障碍，阻碍着我们走向通往真理的道路，那么，研究谬误，揭发错误之所以得以存在并大逞其淫威的规律，探寻医治错误的切实可行的原则、方法和对策，不正是意味着我们在为获得真理而开辟道路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文援朝等同志把错误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试图建立一门相对独立的

学科——医错哲学，是有充分根据的，也是一种富有真知灼见而带开拓性的工作。《医错哲学》这种立意本身就说明作者一开始就使自己站在一个新的制高点上，它体现了文援朝等同志深沉的历史意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理论上的创新精神。

文援朝同志是我所熟悉的一位刻苦好学、善于博采深思的青年学者。为了实现他的上述理论抱负，他在医错哲学这块处女地里，锲而不舍地辛勤耕耘了10多年。开始他用7年时间推出了他的初步研究成果《错误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初版）。这部专著一出版便引起了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重视，至今不仅连续重印了2次，许多重要学术刊物为其发表评介、书讯，而且还获得了包括湖南省第二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在内的多次大奖。真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曾为之感到由衷的高兴。但是，更难能可贵的是，文援朝同志并没有因此而满足，而是百尺竿头，不断攀登。这次，他又和他的合作者在《错误论》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和深化自己的研究，推出了《医错哲学》这部专著，这是文援朝等同志学术研究中又一个可喜的进展，也是他和他的合作者为建立医错哲学这门新兴学科所立下的又一块丰碑。

读了《医错哲学》之后，我感到它与《错误论》相较，在理论上有了如下新的突破和升华：

第一，它构建了一个关于医错哲学的较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记得在大学阶段，我曾经读过刘少奇同志的著作《人为什么犯错误》（内部本），读后深受教育，它使我知道了人之所以犯错误，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内中大有学问；一个人要避免或少犯错误，就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加强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刘少奇同志的这本书虽然篇幅不大，严格说是一篇较长的文章，但它在党的思想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后来的30多年时间里，虽然也偶尔看过为数很少的关于“错误”问题的几篇文章和几本小册子，但这些文

章和小册子都只从某一角度、某一方面、甚至某一事例来论述“错误”问题，真正把它作为一门科学来论述，构建一个严肃而完整的理论体系，可能由于我读书太少、知识浅薄，最少至今我还没有见过。《医错哲学》一书在这一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该书阐述了医错哲学的研究对象、目的与方法，提出了错误本质论、错误发生论、错误类型论、辨错论、治错论、防错论、化错论等逻辑上首尾一贯，环环相扣，层层深化的医错理论体系。我以为这应该说是大理论创造。

第二，它为人们提供了一整套辨错、治错、防错、化错的思维方法。《医错哲学》所提出的这些方法，在辨错方面，论述了实验法、广察法、“双表法”、“剥笋法”、“会诊法”；在治错方面，分析了“人·错分割术”、社会控制术、惩戒结合疗法、心理分析法、冷处理法、综合疗法等一般治错术，还论述了自省、自责、忏悔、自我净化、自赎、自新等治自我错误的方法，以及双向明责法、关系超脱法、箴规婉导法、进谏法、治妒术等治非我错误的方法；在防错方面，从心理的角度分析了约欲法、控情法、治性法、育志法、调控法、慎独法、防妒法，从实践与理性的角度提出了科学实践法、探错法、怀疑法、慎思法、预测法；在化错方面，讨论了分化术、逆推术、“淘金术”、“接生术”等等。这就不难看出，围绕着辨错、治错、防错、化错等问题，作者广泛地摄取了众多学科的有关研究成果，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多方面的综合考察，把这些问题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对待。不管这些研究是否完善，但这个系统化的本身，就能给人以有益的启迪，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第三，它在医错理论的应用研究方面也作出了奠基性的可贵尝试。《医错哲学》提出了把医错哲学应用到各个实际工作领域中去的一系列设想，并对道德生活和经济活动中错误的防治问题作出了初步的具体研究。当然，我们不能苛求作者在社会生活的领域中都作

从一开始就很成熟、很全面的研究，这也不是一本书所能够解决的问题。但作者在道德生活和经济活动这两个领域中关于错误防治问题的研究方面开了个好头，具有某种示范性质，体现了作者能够从理论的象牙塔中走出来，不满足于对医错哲学的纯理论的探讨，而是力图将其理论研究的成果应用于对实际问题的分析。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服务于实际的精神，正是我们今天应该提倡和学习的。根据作者的构想，医错哲学还可应用到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司法、管理等众多的领域，这是一个宏伟的蓝图，是需要广大理论工作者和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共同努力、密切配合才能成就的一番大事业。我期待着作者在对道德错误和经济错误的进一步研究中和将医错哲学应用到其他领域的研究方面取得更多的理论成果。我也相信，会有更多的理论工作者和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对这种研究发生兴趣，和作者一道在这个前景广阔的园地里共同耕耘，作出贡献。

总之，我以为文援朝等同志的《医错哲学》是一部起点较高、视野广阔、研究深入、新见迭出、富有开拓性和创造性的学术专著。它的出版，不仅对于繁荣我国的学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适应了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的需要，对于帮助我们更加理性地、自觉地对待、避免和克服在实际工作中所可能出现的各种错误，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尽管错误穿上了真理的外衣，人类还是自有克服错误、超越错误的本领，这就是我读《医错哲学》所得到的又一重要的启示。我衷心地祝贺《医错哲学》的出版。

是为序。

唐凯麟

1995年11月15日

于岳麓山下

序 二

我原与文援朝先生素不相识，1991年岁末，参加学术会议归来的好友陈瑛同志交给我一本文清源（即援朝先生）所著的《错误论》，让我给《中国哲学年鉴》写个新书介绍。一读，便被他那独辟蹊径的理论胆略、鞭辟入里的理论剖析、清新优美的文字所吸引，“昼夜兼程”，一口气读完了全书。这是我多年不见的一本好书，读来觉得有一种难以言表的精神享受。

为《年鉴》写完简介后，总觉得还没有把该书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说清楚。如不再作评介，深感有负于读者。于是，我又写了篇题为《一座从错误通向真理的桥梁》的书评，发表在《哲学动态》1992年第7期上。从此，我与援朝先生常书信来往，探讨一些共同感兴趣的学术问题。

在《错误论》的末尾，文先生提出了建立“医错学”的构想，并对“医错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和方法，“医错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探讨“医错学”的价值和前景等问题，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我一直盼望着能早日读到他的这部新著。

果然不出所望，今年5月中旬文先生给我寄来一本由他主持撰著的《超越错误——医错哲学及其应用研究》（以下简称《医错哲学》）打印稿，征求我的意见，并向我求序。我为能成为该书的第一位读者而庆幸。于是，立即放下手头的写作任务，开始拜读这部大作。读后有与初读《错误论》相同的感受。

《医错哲学》，可以说是《错误论》的姊妹篇，是它的继续和发展。不同的是，《错误论》侧重于对“错误病”成因的理论剖析，《医错哲学》偏重于对医错哲学原理的系统阐述和对如何医治形形色色“错误病”的应用研究。

我国哲学界过去对认识论的研究，往往只注重宏观方面基本原理的阐释，所以进展甚微。改革开放以后，哲学研究者们认为，要使认识论研究突破旧的框架，取得理论上的新进展，必须由宏观转向微观，即对在宏观认识论研究中长期争论不清的问题，分门别类地进行专题研究，在此基础上，再去详细论述某一个别的认识论问题，使之能对人的认识活动具有可操作性。在人们多从正面效应去探讨达到真理性认识之途时，文援朝等同志则从另一个新视角，由认识和实践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种种错误带来的负面效应中，去寻找通向真理性认识的道路。他们在《医错哲学》中，为我们提出了一整套系统的“辨错术”、“治错术”、“防错术”、“化错术”。辨判错误，就是对错误病的诊断。因此可以说，辨错是治错成功与否的关键。作者站在哲学世界观的高度，对唯心主义的单一标准观、形形色色的多重标准观和相对主义的标准观，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与批判。在论述实践唯物主义的实践标准观时，作者对它与旧实践标准观的渊源关系作了系统的考察，认为旧的实践标准观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实践标准观的直接理论来源。同时又告诫人们不要忘记，同为实践标准，仍有唯心与唯物之分。作者在强调实践标准的辨错功能的同时，又提醒人们不要忽视正确的理论模型在辨错中的作用。他们认为，如果“形而上学地强调实践标准的‘绝对权威’，就只能在理论上空谈实践标准，在实际工作中陷入盲目性而导致失败。”这种空谈，表面上是抬高、肯定实践标准，实际上是把具有自觉能动性的人类实践，降低到了动物的盲目行动的水平。因此，作者认为，那种否定正确的理论模型的辨错功能的观念，实际上是对实践标准的真正否定。当

谈到实践标准与逻辑标准的关系时，作者认为，“逻辑的规律和推理规则与实践标准，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因而在辩错过程中它可以在它的有效范围内，代理实践标准的部分职权。”

诊断的目的是治病，辩错的目的自然是治错。那么，究竟应当如何对症下药，医治人们的“错误病”呢？对此，作者提出了自己的治错“七原则”。首先，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治错，是通过揭发和批评以前的错误，给犯错误者以必要而恰当的惩处，使之吸取教训，不致重犯；其次，是有错必治，就是说，有了错误绝不能讳疾忌医，而必须主动地接受治疗；其三，治错要治本；其四，治错要随时、及时；其五，治错要迅速、彻底；其六，治错要讲究艺术；其七，治错要辩证地系统施治，切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接着，作者又根据不同患者的不同病情，提出了自己的一套治错技巧或方法，这就是：“人·错分割术”，社会控制术，惩戒结合疗法，心理分析疗法，冷处理法和综合疗法等等。

在作者看来，治错是被动的，防错才是积极的，那么，如何才能做到防错于未然呢？作者认为，防范认识错误和实践错误的方法，主要有心理控制调整法和实践·理性训练法两大类。但是就此二法相比较而言，作者认为，为了防范错误的认识和盲目的实践，特别需要进行实践训练和理性训练，并应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实践和理性思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实践脱离科学的理性思维则盲，理性思维脱离科学的实践则空。二者如能同步走向科学化，就能从根本上防范错误。故此，我们必须加强思维训练，提高理论思维水平。

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在错误面前束手无策。如果能够真正掌握《医错哲学》为我们提出的那些切实可行的对策，那就可以化错归真，使错误转化成正确的东西。

在该书的诸多论述中，最具现实意义的是对“合理错误与非合

理错误”的划分。我认为作者这样划分的用意，是在鼓励人们为寻找真理、作出科学发现和发明，敢于去犯合理的、不可避免的、尝试性的错误；告诫人们不能犯非尝试性、可免性和不可原谅性的错误。据此，作者郑重指出：我们在选拔干部时，应选那些有创新能力、开拓精神和发展潜力，而又敢于和善于犯合理错误的人，绝不可任用那种八面玲珑、“从不犯错误”的平庸无能之辈。

《医错哲学》讨论的问题甚多，涉及的范围很广，可以说是一部“医错学百科全书”。因此，不可能在一篇短短的序言中，把它内含的理论精华和实践价值全部介绍给读者。我想，读者只要精心阅读，细心品味，定会从中受益。

张 浩

1995年6月12日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前 言

真理与错误是人类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中的一对双胞胎。真理总是与错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

人无完人，孰能无错？任何个人和团体的活动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主观的和非主观的种种条件的制约，因而在对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认识、探索与改造中，都难免犯错误。犯错误本身并不可怕，也并非真正的悲剧。真正可怕的悲剧是，在错误面前陷入盲目性，对错误缺乏理性的批判能力，不能有效地超越错误，甚至用新的错误去掩饰旧的错误，导致错误的蔓延与流行。

一切热爱和追求真理的人们，不能不注重对错误的超越问题的研究。因为通向真理的道路常常是以错误为基石的。不能超越错误，也就无法发现和掌握真理。超越错误，是对错误发生规律的深刻把握，对已经发生的错误的自觉辨识与有效医治，对尚未发生的错误的科学预测与理智防范，对化错归真的方法和医错哲学的应用技术的娴熟运用。真理论与错误论是同一个认识问题的两个不同的方面。对错误问题的系统而细致的探讨，将有助于对真理问题的全面而深刻的研究。

我对错误问题发生兴趣，始于一次偶然的机。1983年秋，我在启程去华中师范大学攻读哲学硕士学位前，求教于我大学时代的老师曹利风副教授，他认为在认识论方面有几个课题值得探讨，其中一个是关于人为什么犯错误的问题，我从中受到很大启发。也就

是这一席话,把我引导到了对错误问题进行研究这一方向上去了。我当时只是朦胧地觉得,这是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课题。其后不久,我在武汉读书期间,在逛新华书店、逛图书馆时,便留心与此有关的资料。后来,先后从书店买到了荣开明先生所著的《人怎样少犯错误》,齐振海先生所著的《人为什么犯错误》,黄洪基先生著的《错误与认识》,又从林双忠老师那里借来了刘少奇的《人为什么犯错误》,通过拜读这些著作,从中受益匪浅。我逐渐感到,关于人为什么犯错误和怎样少犯错误,既是哲学认识论中一个较被忽视的学术问题,又是一个对任何社会、团体和个人都有重要实践意义的课题。此后,我对错误问题的兴趣便日趋浓厚,对这一研究工作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的认识也逐渐达到理性的确认。在攻读硕士学位的三年间,课余时间,费时最多的,一是查找资料,做了大量卡片,准备编一本《英汉哲学词典》(由于未能联系好出版社,此书一直未能面世,几年后,有两家大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这样的词典,我的这一本来准备“填补空白”的劳动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二是以“错误论”为思维中心,查阅大量文献,构思写作框架。当时,口袋里总是揣着一个笔记本,一有感想就记下来。到1985年夏,已初步形成一本书的写作计划,并征求了曾钊新、曹利凤两位先生的意见,得到他们的支持和指点。1985年秋,在硕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中,我首次提出了“错误学纲要”的写作提纲,得到了导师王幼殊、曹方久教授及李本先、林双忠和唐有伯等教授的指教与鼓励。我的学位论文便以这一纲要中的一章为题,研究错误的发生机制。在正式动手做论文前,先后拜访了齐振海、夏基松、张尚仁等专家教授,得到了他们的肯定与指教。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我的思维中心仍然没有离开过“错误论”。又经过一年的资料准备和思维准备,对“错误学纲要”作了进一步的修改。从1988年暑假开始动笔写作,到

1990年暑假完成了一部30多万字的书稿。关于这一段写作经历,在1991年6月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错误论》的“自序”中我是这样记录的:“这本书,从搜集资料到写作,从初稿到第三稿,花去了7年光阴。在这7年中,除了学习和教学外,我的寒暑假和星期天大都被这个‘可爱而又可恶’的错误之谜所占有。我为探明她的行踪而四处寻找,为揭去她的面纱而遨游书海,为求索她的奥秘而苦苦思考,为思恋她的情影而常常失眠,有时为遭到她的冷遇而烦躁不安,有时为博得她的热情而欣喜若狂。在我抓住她之前,她已牢牢地抓住了我,她使我着迷入魔,神魂颠倒,欲罢不能。其中的酸、甜、苦、辣,不可言传,唯有具有同样创作经历的人们才会理解。目下这部书,便是7年苦恋的产物。”

《错误论》出版后,《中国图书评论》(1991年第5期)、《光明日报》(1992年2月20日第3版)、《中国哲学年鉴》(1992年)、《哲学动态》(1992年第7期和第9期)、《社会科学辑刊》(1992年第2期)、《长沙水电师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辽宁新书报》(1991年第162期)等先后发表书评或书介、书讯、书目。还先后得到陶德麟、高清海、唐凯麟、陈中立、陈瑛、张浩、荣开明、刘宝三等专家教授的勉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张浩研究员、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李兴武研究员、中南工业大学社会科学系曾创新和曹利风等专家教授先后为该书撰写书评或者书介。该书1992年8月获北方15省市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1992年10月获辽宁省“优秀图书编辑二等奖”,1993年12月获省哲学学会颁发的湖南省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哲学著作一等奖”,1994年4月获省委、省政府批准颁发的“湖南省第二届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该书1994年9月被列入《负面文化研究丛书》(曾创新教授和我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出版)重印了1次,1995年上半年又重印了1次,总印数已达到16000册。其发行已扩大到

新加坡、香港、台湾。海外一家学术出版社已购买该书的繁体字版权。这些荣誉与成绩的获得，应当归功于时代与前贤，归功于辽宁人民出版社和该书责任编辑赵炬同志及在出版前认真审读该书稿并极力向出版社推荐出版的李兴武研究员和曾创新教授，归功于对我的科研提供指导、帮助和给予鼓励、支持的众多专家学者，归功于为我创造良好的科研条件的中南工业大学。没有这些条件，就不会有《错误论》；即使写出了它，也不会如此迅速、顺利地与读者见面；即使能够面世，也不可能取得较大的社会反响。

1991年，曾创新教授在为《错误论》所作的“序”中，曾提出一个殷切的期望：“我期待着文清源同志构想的与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生理医学、犯罪学、越轨社会学、道德心理学、行为科学、认知科学等学科交叉而不雷同的‘医错学’，在它经过该有的孕育期后能分娩降世。”在《错误论》出版后，他的这一代表着哲学界不少老前辈的期望，一直是我继续对错误问题进行探索的压力与动力。目下这本《超越错误——医错哲学及其应用研究》便是在这种压力与动力的交互作用中产生的一份不得不交的答卷。

这本书是《错误论》的续篇。《错误论》只是我循着前人的思维轨迹作一新的探索的初步学习心得，在不少方面还只是提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在该书中我虽然提出了建构“医错学”的基本设想，但还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体系。因此，从1992年6月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华基金研究课题立项开始，我作为“医错哲学及其应用研究”课题组的负责人与其他成员吕耀怀、王静芳、黄河、涂争鸣诸位副教授及周才文、贺肿两位讲师等同仁一道，继续对错误问题进行探讨，并试图将之应用到对实际问题的研究中去，于是便产生了《超越错误——医错哲学及其应用研究》。

在原理方面，我们在《超越错误——医错哲学及其应用研究》中力图建立一个比《错误论》更为成熟的理论体系。经过斟酌，对原